

# 砚铭随谈

谭然

“受害面”也在年年扩大。我们市里，有这传统的小学 and 神社，已因为同样的理由相继“偃旗息鼓”，我们学校能坚持三十年已属“长寿”，我因为曾经为学校的 PTA 服务多年，所以才知道每个环节藏着多少辛苦，才知道要持续这个众人期盼的传统，需要多少人几十年如一日默默无酬的付出。就说那“圣火”吧，每次都是学校的老校工，在众人散尽后，独自留守火堆数小时，在寒风中默默地拨弄着，直至彻底熄灭，然后埋进土中。

为了不使传统悠久的“爆竹节”在小孩子们的心中仅仅留得个“焚烧年饰、烘烤米团”的简单印象，在去年最后的“爆竹节”上，校长特地和大家一起重温了这个传统的起源和目的。校长说：我们每个人作为个体是很弱小的，但是，和伙伴在一起，大家共同经历了“爆竹节”这样的仪式，每个人的心中就会生出一股强大的力量，从而能够保护自己、保护家人和同伴。所以说，“爆竹节”真正的目的，在于加强地区的团结和让每个人获取抵御邪恶的强大之心，这是先人的智慧。至于吃烤米团和烧习字呢，校长补充道，那不过是“爆竹节”派生出来的想法而已。

常听人说日本人团队意识强，聚在一起力无穷等等。原来，这种意识的培养和像“爆竹节”这样的传统仪式密切相关呢。日本民间保留着许许多多历史悠久的传统仪式，有的已成为观光热点和地区特色。这些仪式，大凡和神的信仰有关，也是凝练住民、维系社区发展的重要手段。但是，如何使这些古老的传统在现代生活中存续下去呢？我们学校“爆竹节”的“命运”也是日本各地共同的担忧。

# 日本小正月的“爆竹节”

当当

日本小正月有个与火有关的传统仪式，大多数地区管它叫“どんど焼き”（dondoyaki），也有部分地区称它为“左义长”（sagicho），日本小学馆出版的《日中辞典》把它译作“爆竹节”。那些迎接年神用的精美年饰，如门松、注连绳（草绳、草环）等，完成了各自的使命，都将汇集在这一天化作祛邪消灾的烈火和送神归天的神烟。

“爆竹节”这个译法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春节震耳欲聋的鞭炮。虽然这活动确实间接地受到了中国传统的启发，也确实古书上留下“爆竹”两个汉字，但它从不放烟花爆竹，气氛也更为肃穆，“咚——，咚——”是火中爆竹燃爆的声响。“爆竹节”既是送神也是新春的祈祷活动；祈愿新的一年无病无灾、举家安康、五谷丰登、繁荣昌盛。这是个以社区为单位的集体活动，从冲绳到北海道，几乎所有地区都保持了这一传统。

这本是古时农耕村落的一种仪式。古人把这仪式选在农历正月第一个满月日，也就是正月十五的夜晚，因为农历的小正月正值万物回春、农作开始之时。汉字“年”的语源是“禾”，所以，日本人自古就把年神视为主管五谷丰登的神灵。年神每年都会带来新“魂”（新生的力量），新年里它被千家万户迎进家门，据说就停歇在年饰之一的“镜饼”上（一种两层相叠、形同古镜的圆饼状年糕）。把神送走以后的一月二十日，由一家之长或一社之长破镜分饼，分享年神留在镜饼上的神力。明治6年（1873年）开始，日本改用阳历。从此，农历正月里的一系列传统活动，包括“爆竹节”都“迁”进了阳历一月。

我们学区的小学是市里少数几家把这一传统纳入本校年度活动的学校之一。三十年前，因为学校的一位“老土地”家长和地区民生委员的积极奔走，这个古老的传统才得以走进校园，走进一届又一届小朋友的心里。

我们学校的“爆竹节”分“送神归天”和“余火烤米团”两个部分。传说吃了圣火烘烤的米团，一年没病没灾，即便身子被圣火映照，也会有同样的效果。因为这活动是三年级社会科讲义《过去的生活》的一部分，所以，烤吃米团自然就成了三年级小朋友享有的“特权”。

每年新年一开学，学校就会发出通知，告知当年“爆竹节”的点火时间和年饰的回收地点。除了年饰，也回收“失效”的玩偶达摩和新年习字，后者日语叫“书初”（kakizome）。大正月挥毫习字赋诗，在日本属新年的吉利事。日本人“迷信”：当新年习字随火苗高高蹿起时，习字者的书法水平也会随之大大提高。

搞“爆竹节”，有不少准备工作。除了筹措稻草、竹子和松枝等燃料，张罗烤米团用的树枝也是件耗时费事的活儿。烘烤米团需要一百多根近两米长的树枝，要长得直还至少带三个分叉的，好叉米团。日本公立学校有个叫做 PTA 的组织（以家长为主的教师家长联合会），每年那百多根树枝，都是我们学校 PTA 的新老会长们挑美女似的一根一根从校园的树丛里精选出来的。“上蹿下跳”一根根锯下不算，还得把叉米团的一头稍稍削尖，然后交给 PTA 的女士们“整枝”：剪去多余的分叉，检查有没有扎手的地方。三年级的妈妈们负责做米团，一

做就是三四百个。一根树枝分叉三个，要准备一百数十根的份呢。搞这活动的大多数地区都是一根树枝又一个米团，为什么我们地区一定要拘泥于三个呢？记得指导这活动的民生委员说过：三个米团，一个为自己，一个为家人，一个为朋友，重视团结互助是我们地区的传统。除了做米团，妈妈们还要熬糖汁，因为米团本身淡而无味（还硬邦邦的）。每年给三年级小朋友吃的是淋上特制糖汁的“蜜大拉西团子”（mitarashi-dango）。糖汁由水、砂糖、酱油和淀粉烧煮而成，三年级老师提供的配方，似乎特别精美。

最“光荣的任务”是在“爆竹节”当天为年神搭建“小屋”，他老人家将从那里出发。老师当天要上课，这事每年都落在了 PTA 新老干事和地区的民生委员身上；女士们负责把学校回收的几大箱年饰“解体”：取下不宜燃烧的塑料饰物和铁丝部分，男士们则在“老前辈”（当地民生委员）的指导下为神建房。

“小屋”呈圆锥形，中间竖着一根高达十米左右的巨竹。巨竹从头到脚包着易燃的松枝，上半段还挂着大大小小的达摩，沉得抬不起来。巨大的下半段被松枝里三层外三层裹得厚厚实实，像个粗壮的巨人。“小屋”的骨架由青竹、木枝混搭而成，上面层层铺着“解体”完毕的年饰和一捆捆稻草，回收来的新年习字“镶嵌”其中。“小屋”搭建完毕后，PTA 老会长恭恭敬敬地在里面放上了两块黑乎乎的石头。那是我们地区的“道祖神”，又称“塞之神”。“塞”与“岁”日语同音，所以每年都请来“扮演”年（岁）神。

我们神奈川以及山梨、长野、新潟等县有信奉“道祖神”的传统，这个信仰一直和“爆竹节”紧密结合在一起，所以“どんど焼き”（dondoyaki）又叫做“道祖神祭”。听老人说：我们的先人相信人之初性本善，之所以后来会变成干坏事的恶人，是因为受到了外敌的诱惑或胁迫（流行病也是“外敌”的一种）。所以，从前村口村界都供有“道祖神”（界碑），以保护自村免受外敌入侵。请“道祖神”光临“爆竹节”，图的就是在新年之初，借地区守护神之力与火焰自古就有的驱邪消灾的力量，净化每个人的心灵，加强彼此间的凝聚力。

这个质朴的信仰，在大力推崇国家神道的明治时代差点遭殃。当时，一声令下“神佛分离”（这之前神社归寺院管辖），各地还搞起了有点像十年浩劫中的“排佛毁寺”运动。“道祖神”属佛教范畴，“道祖神祭”因此被下令取消。估计是百姓急中生智，硬把“道祖神祭”的源流和平安时代宫中中小正月的“爆竹节”（称“左义长”）“挂”在了一起，才得以逃过一劫，流传至今吧。

每年的“爆竹节”都放在上午第二节课后的大休息时间段里进行。点火二十分钟之前，全校师生已在操场集合。操场的周围站满了一起来送神的居民，附近幼儿园、保育园的小朋友静静地坐在上风口。每年，园长们都带大班的小朋友来这里感受日本的传统文。

十点半，点火仪式开始。先由地区的民生委员代表简单地介绍这个活动的意义，校长接着话茬向所有助力者致谢之后就宣布点火了。只听“噼”的一声，火苗从小屋窜出，很快引燃

了周围的松枝干草细竹。伴随着“咚——，咚——，噼里啪啦”的声响，黑黑的灰烬在风中飞舞。火焰借着干草松油和劲风扶摇直上，在场的人都被圣火的威势镇得屏息静气。一眨眼，“小屋”已是一片火海，不到十分钟就烧得没了形骸，只剩低头弯腰的巨竹在空中摇晃，吓得挂在上面的达摩们一个个瞪大了眼睛。火舌越蹿越高，突然，小朋友们喊了起来：“达摩着火了！”PTA 老会长们见状顺势将巨竹慢慢放倒，可怜的达摩这下彻底掉进了火堆。“噼里噼里、啪啦啪啦”，想必达摩在一阵痛苦的煎熬之后，也追年神而去了。

当火势减弱时，三年级的小朋友们乐滋滋地举着又有米团的长枝登场了。在大人们的指点下，他们把叉着米团的一头小心翼翼地伸向余火。“哇，好热啊”，“糟糕，我的米团碰掉了！”小朋友们兴奋地嚷嚷着。这当口，三年级的家长们已端出长桌，放上餐具、热好了糖汁。当小朋友们扛着热乎乎的火团回到桌边，家长们赶紧帮他们取下烫手的米团放进本人的饭盒，再淋上几勺糖汁。有个经常挨训的“皮大王”，居然想到省下一个米团带回去让妈妈尝尝，听得大家

都很感动。看来圣火确实有净化心灵的效果。吃烤米团虽然并不是“爆竹节”的本意，但小朋友们因此而记住了这个传统。从前，在全国大多数地区，这活动的主角是中学以下的儿童，因为儿童既是神的使者，也是地区的未来。在活动准备阶段，大人小孩各有分工一起忙活，促进了男女老少的交流和地区的团结，同一住区，有一种“融融大家庭”的感觉。我们学校的那些 PTA 新老会长们，想必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的吧……

一晃，孩子小学毕业已有五年。去年，当我翻出越积越多的年饰准备参加“爆竹节”时，意外地得知：因为种种原因，我们学校不得不给这个传统活动画上句号。这些年，随着周围的水田不断变为宅地，搭建“小屋”的材料，如稻草、竹子等已经越来越难以觅到。记得以前连续几年，做“小屋”主心骨的巨竹都是从一位 PTA 老会长的院子里砍来的。另一大原因，是附近居民对烟和灰的抱怨。每年“爆竹节”之前，学校都要向居民“书面打招呼”，由老师们挨家挨户把信投到附近居民的信箱里。随着学校周围住宅的密度不断增加，烟灰的



# 笔会

欢庆精灵  
(铜雕)  
蔡政维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

## 序跋精粹

# 从外滩公园走出的虚构批评

袁小龙

《外滩公园——袁小龙虚构批评随笔集》中收入的文章，基本上都是我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起，在美国开始用英文进行小说创作后，断断续续地用中文写成的，也有一部分先用英文写，后来又改译或改写成了中文。也许多少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我在美国圣路易华盛顿大学读比较文学博士课程的日子里，接受的是传统学院式的训练，后来却因为种种意想不到的因素，没有沿着写学术性研究论文这条路走下去，转而开始用英文进行文学创作。回想起来，这或能追溯到卜之琳先生在许多年前对我的影响。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跟读英美文学硕士研究生时，每星期在他东四胡同的家里，他跟我谈得更多的其实是有关怎样写诗及小说。于我而言，他首先是诗人，然后才是学者和翻译家，也正是在他这样的言传身教下，我开始了中文诗歌创作。

但也许更有讽刺意义的是，当我后来用英文写起了陈探长系列小说时，我却又转过身来，时不时地用中文写些多少带有学术意味的文章。一方面是因为我在主观愿望上，不想就此扔掉了自己的中文与学术背景，同时也隐隐感觉到，在不同的语言背景的交替写作中，两种文字、文体的感性也会产生些有意义的互补和融合；一方面是因为在一本接一本小说的写作中，自己与学院派的写作风格是渐行渐远，

也确实没有足够的精力去写长篇的、正儿八经的学术论文；还有一方面，则是因为受到了原先未曾意想不到的一些影响。

首先应该说虚构批评(fictocriticism)的影响。2010 年左右，我去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任短期客座教授，与大学英语学院的史迪芬·缪克(Stephen Muecke)教授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学术交流。他是虚构批评的一个领军人物。作为一个后现代的新批评潮流，虚构批评把故事、批评、理论的写作融为一体，这尤其是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有了长足发展。我刚到新南威尔士大学，史迪芬·缪克就送了的一本他自己的短篇小说集，《在安特曼群岛中的乔》(Joe in the Andamans)。在接下来的几天中，我大部分时间还真都是趴在悉尼的海滩上读这本书。Fictocriticism 是一个合成词，从这个词前半部 Ficto 的组成看，有像虚构写作地那样写的意思，却不一定是指虚构作品，也可以从日常生

活中的真实经历写起，这个词的后半部 criticism 则指的是批评或批评理论。在我们后来的探讨中，史迪芬·缪克给我发过一个电子邮件，为虚构批评作了一个特别简明扼要的定义，“在讲一个故事的同时，展开一个论点”(telling a story and making an argument at the same time)。

确实，史迪芬·缪克的批评专著读起来感觉是不一样的，叙事生动，举重若轻，充满了栩栩如生的细节，仿佛作者就坐在你前面，絮絮而谈地说着日常生活中的故事。在作为《在安特曼群岛中的乔》一书的书名篇中，作者讲的就是他本人与他儿子乔，父子俩一起去安特曼群岛的游历。他们在旅途中所经历的一幕幕现实场景轻巧、幽默、生动地印证了作者所要证明的论点，好几次都让我忍俊不禁，但又发人深思。说到底，现代或后现代的理论批评放到了日常叙事中，自然而然地加以阐发、论述，读的时候感觉就不同于那些抽象、枯燥、艰涩的理论

著作，处处堆砌着生造而借屈聱牙的词汇，好不容易读了下来却还似在云里雾里。

史迪芬·缪克的虚构批评我之所以读得津津有味，自然也可能是与我自己这几年侧重(虚构)小说写作有关，因而觉得他那种讲故事一般的文学理论批评更读得下去，至少是在自己身上引起了更多的反响和共鸣。

我于是尝试着把自己的一些文章也放在日常生活场景的叙述中展开，仿佛在讲一个个故事。这些文章或日常生活中的故事，在作为《在安特曼群岛中的乔》一书的书名篇中，作者讲的就是他本人与他儿子乔，父子俩一起去安特曼群岛的游历。他们在旅途中所经历的一幕幕现实场景轻巧、幽默、生动地印证了作者所要证明的论点，好几次都让我忍俊不禁，但又发人深思。说到底，现代或后现代的理论批评放到了日常叙事中，自然而然地加以阐发、论述，读的时候感觉就不同于那些抽象、枯燥、艰涩的理论

著作，处处堆砌着生造而借屈聱牙的词汇，好不容易读了下来却还似在云里雾里。

发生的事，写在中国发生的事，常常让我想到《红楼梦》中的两行诗，“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在我们日常现实中发生的事似乎更多是虚构或虚构的感觉，而且还常常是在一些意想不到的时间和地点。真假有无之间，充满了特色的张力和荒谬，真假假假、匪夷所思，真实与虚构的界线正变得越来越模糊。因此在这些文章中写到的事、或所谓的故事，基本上都可以说是真实的，只是用了写虚构作品的笔法在写。

无需赘言，集子中并非每一篇文章都是刻意作为“虚构批评”来写的，读者也没必要一定要这样来读。从文类上说，集子中一些文章的结果安排，自己有着故意的混杂在内。这里不妨再引用史迪芬·缪克在《在安特曼群岛中的乔》的“引言”中说的一段话，“虚构批评自然是个很大的范畴，也只能如此——如果说它的写作灵感是来自自身的事物或情景。人们不妨对感兴趣的作品作些评论，别觉得他们的写作一定必须要符合另外一个模式的规范，而是要有信心，他们面对的情形中所特有的问题，会出乎意料地使他们改变写作方法。”

这些文章终于放在一起了，自己再看一遍，好像也聊备一格，或许可以名之为自己的“虚构批评”吧。

《外滩公园——袁小龙虚构批评随笔集》即将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张中行先生有一文提到顾二娘观的真伪，说请教启功先生，提出两个问题：一个是，您见过多少真顾二娘做工的？另一个是，譬如从刀法上，风格上，能够断定不是出于顾二娘之手吗？启功先生言简意明，只用六个字就交了卷，是“没见过，不知道”。有人读到此段，觉得是启先生一贯的幽默作风，说了一段笑话。我读至此则耿耿不已，认为启先生一定是发自肺腑地说了六字真言，是真话，是内心话，并没有一丝幽默敷衍张先生的意思。

为什么这样说呢——《启功丛稿·题跋卷》里有一篇《书画鉴定三议》，分别谈“书画鉴定有一定的模糊度”，“鉴定不只是真伪的判别”，“鉴定中有世故人情”。文中有一段说：“王静安先生对学生所提出研究的结果或考证的问题时，常用不同的三个字作答：一是‘晓得’，一是‘弗晓得’，一是‘不见得’。王先生的学术水平，比我们这些所谓鉴定家们（笔者也不例外）的鉴定水平（学术种类不同。这里专指质量水平，恐怕谁也谈不上说低吧？我现在几乎可以说，凡有时肯说或敢说自己有不清楚，没懂得，待研究的人，必定是一位真正的伟大鉴定家。”读过此文便可知道不论是书画还是器物，老先生在鉴定上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由此及彼，关于砚铭之真伪，不妨以晋唐书法名画视之，既然右军墨宝，虎头真笔迹不可寻，而唐摹本下真迹一等，又经历代名公审定，已视同球璧。而砚之佳者，五好标准一达标，可赏可玩，有佳铭锦上添花，又有何不可呢？不知诸君以为然否？